

大疫情之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愿景、 进路难题及其挑战

邹庆治, 刘 琦

摘 要:发轫于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政治哲学基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构造一整套围绕着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与治理目标的公共管理政策体系,而是还要努力创建将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相结合的新经济、新社会与新文化。2020 年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既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更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未来图景的许多理论构想,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但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同时基于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考量及其二者有机融合的历史和理论自觉,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切实持续取得成效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前提性条件。

关键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经济愿景;社会愿景;进路难题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1)03-0001-1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3.001

2020 年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既是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生命与生活带来沉重代价、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的严重灾难性事件,也构成了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必须冷静面对并做理性思考的经典性事件,提出或凸显了许多需要从根本上加以反思和重释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尽管如此准确判定它的历史性长远影响现在还为时过早——比如究竟是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上半叶甚或更长时间跨度的意义上^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将与它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的实际影响及其所导致的国际秩序变化密切相关。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将首先概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然后依次探讨这次历史罕见重大疫情所彰显的它所面临的三个方面问题或挑战,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未来图景三大构成要素的“经济愿景”、“社会愿景”和“进路难题”,以期推动这一议题领域的更深入讨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ZDA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AKS016)

作者简介:邹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qzhuang@pku.edu.cn (北京 100871);刘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参见 Peter Alagona et al., Reflectio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era of COVID-19, *Environmental History*, 25/4 (2020), pp. 595—686; 张蕴岭:《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文化纵横》2020 年第 6 期;邹力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影响和启示》,《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4 期;李海东:《疫情如何深刻影响国际关系格局》,《人民论坛》2020 年第 11 期。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

概括地说，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的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或“自然观”）的要义，是在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地和社会历史文化地互动的意义上，来理解、面对和改变（利用）自然^{[1](P21-23)}。“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2](P516,534)}。

具体而言，一方面，“人”是能动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实践（感知）主体，而不是被动适应性的、单纯个体性的、固定不变的物质（生物）存在。也就是说，同时与他们自身和周围自然界发生着关系的人类主体，既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动个体（部分是由于有着远远超出动物维持生存必需条件的复杂的综合性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意愿），又会呈现为日趋复杂精致的社会与历史形式。另一方面，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自然”，也首先是一种被人类活动（包括从感知审美到经济社会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形式）对象化或“人化”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自然——或者说“第二自然”或“人工自然”，而不再是与人类活动或存在无关的原生态的、孤立的或生物物质意义上的“自然而然”。换言之，我们平常所指的自然生态环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作为人的生存生活条件或“活动对象”而存在或被关注的，因而那些看似只是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所发生的异常性改变，往往是特定人群、种族乃至人类整体生存生活条件趋于恶化的体现或反映。

那么，这些初看起来有些“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色彩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生态意蕴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基于上述理论立场和思路，至少可以进一步勾勒或阐发出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如下三重“生态意涵”。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态意蕴。从完整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来看，人与自然关系本来就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与社会条件下的多重维度上的和立体性的相互影响与建构关系。比如，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活，就形塑了一种特定构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而这种特定构型的人与自然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甚或固化了以农业与农村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样，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欧美国家的工业化生产与城市生活，也造就了一种特定构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而这种特定构型的人与自然关系又极大地促动了随后远远超出欧美范围的当代社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哲学分析的生态质性或意涵就在于，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历时性上说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不同阶段相关，而从共时性上说则与某一既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抉择或追求相关^{[3](P33-40)}。比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世界）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工业化生产方式与城市化生存方式逐渐占据社会历史主导性地位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和意识形态与文化是它的合乎逻辑的制度化与观念化呈现，最终则是它们彼此之间的渗透交织与庇护支撑，而不再简单是一种谁决定谁的线性关系。相应地，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绝不是对于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完全无视或无动于衷，而是有着它自己的概念化方式与政治政策应对，直至这些努力被最终证明是无济于事或相形见绌。由此可以理解或推论的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将会由于上述两个尺度上的理由而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难以避免的生态环境困境或危机。当然，这种替代只能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变革和社会重建过程，绝非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权转接那样的直接或简单。

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生态意蕴。以《资本论》为主体内容的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同时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生态学批判^①,当然也是深刻的唯物辩证哲学批判。其核心议题或关切在于,传统社会条件下的人类生产劳动(经济活动)如何借助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成为以竞争逐利和资本增殖为最高律令的不断扩展与深化的世界性商品生产、分配、流通和贸易,而这其中所内含着的基本矛盾——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为何必然会带来这一生产方式的持续不断的和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它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意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历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献整理与阐释——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本质上是一个依靠“外部性”存活的社会,而“他者”(包括企业剩余价值生产必需元素以外的所有存在)的“生态外部性”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就像社会不公平和非正义一样,反(非)生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属性。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经济非正义和反生态本质也必然会制度化为相应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体制或观念。也正因为如此,完全可以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现实社会(形态)都同时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的自然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不例外,而社会主义社会尤其如此。换言之,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性克服,将主要通过对经济社会制度框架的重构,或主要是经济社会制度条件的改变,因而更多体现为社会整体系统意义上的、而不单纯是经济或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变革。当然,这种深刻变革不应只是基于或由于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偶然性或暂时性“革命冲动”,而必须是符合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逻辑性结果。此外,这还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它的初始阶段,未必能够完全避免一般物质变换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即使考虑到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技术水平的可能取得的巨大进步。也就是说,即便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也并不能单凭社会关系的合理调节而完全符合(更不必说改变)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客观必然(规律)性要求。

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绿色变革理论意蕴。迄今为止,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着力于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的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的或生态环境友好的思想意涵,也有人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的绿色拓展或填补“生态空场”^②,但其共同的思路是努力使古典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强烈的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关性或敏感度。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当代生态哲学与政治流派的地位——依据前文所做的概括,恰恰在于它明确的环境政治哲学特征。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或“生态学”,构成了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完整的绿色变革政治哲学,同时涵盖了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分析(方法)、对未来绿色社会的愿景构想和如何向这种绿色社会过渡(转型)的政治战略(进路)^[4]。概言之,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理论和生态资本主义的“浅绿”理论相比,基于古典马克思主义认知方法与主要观点的“红绿”理论,更加强调现代生态环境问题更多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社会成因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变革路径,认为针对社会不公平与生态非正义的经济社会斗争与变革是最具根本性的或决定意义的,而且是彼此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两个侧面。这当然不是说,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变革和经济技术手段的环境友好的渐进调整就无足轻重或毫无意义,而是说,离开甚至回避经济社会结构变革或重构的“绿化”,要么仅仅是隔靴搔痒、效果有限的,要么最终会被主流经济与政治驯化或预占。

① 参见吴荣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生态意蕴:与威廉·莱斯的比较分析》,《江海学刊》2018年第6期;任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意蕴及其启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约翰·巴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

② 参见万希平:《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依此而论,发轫于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文本的再诠释或阐发,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关涉与涵盖当今时代的批判性“新哲学”或“新政治”^①,甚或说是“真正的深生态学”^{[5](P278)}。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角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性质的或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人与自然关系,是讨论当前地球生态系统或人类社会(文明)生存延续条件所面临严重危机的重要切入点或维度。

而且,如此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政治哲学基础^[6]。换言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构造一整套围绕着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与治理目标的公共管理政策体系,而是还要努力创建将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相结合的新经济、新社会与新文化^[7]。具体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然要指向或致力于更高质量和更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尤其是在相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情形的意义上。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条件下的自然生态资源公共所有和社会物质财富公平分配,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整个社会生产生活过程(方式)的民主决定与监督,使得整个社会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广义上的经济活动)可以采取更为社会和谐与生态可持续的形式或路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创建一种更高级类型的社会关系,来保障并促进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的自然关系。因而,坚持和遵循一种整体性社会认知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生态可持续性考量之间的辩证法是至关重要的。“绿色新经济”或“生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真实有效的绿色新经济的形成确立与健康发展,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与新文化来“滋养呵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和新文化肯定会彰显或促进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本质不同的社会经济生产与物质生活方式以及个体风格追求,因而会重塑整个社会的经济和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本身。总之,借用卡尔·波兰尼的说法^{[8](P50)},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方面,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脱嵌”的经济重新“嵌入”到整个社会之中,或者说把经济与社会重新嵌入到范围更大的生态系统之中。当然,无论就其本身的综合性、复杂性还是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来说,这都将只能是一个长期性的历史变革或自我转型过程,而社会主义政治追求和领导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目标及其实现来说是前提性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前者就谈不上后者。但就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现实推进来说,这一政治哲学基础还远不是牢固的或明晰的,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过程就提出了至少如下三个核心议题领域的重大挑战,即未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政治哲学图景的“经济愿景”、“社会愿景”和“进路难题”。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愿景”及其挑战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基于的“经济愿景”及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笔者在他文中已做了初步讨论,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意象”和“三个挑战”^[9]。“三个意象”是指“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大规模、集中化的经济生产组织形式”和“物质富裕的美好生活”。可以说,这三个“意象”构成了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经济愿景”的主

① 参见大卫·哈维:《新冠病毒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http://davidharvey.org/2020/03/anti-capitalist-politics-in-the-time-of-covid-19/>, 2020年3月30日;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新冠疫情暴露资本主义三大危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394695926785410&wfr=spider&for=pc>, 2020年3月30日。

导性理论认知^①, 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现实推进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政策话语阐释与大众文化理解。而“三个挑战”则是指上述三个“意象”辩护与支撑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不得不面对的“自然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容限挑战”、“生态环境风险及其管控挑战”和“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性挑战”。在此, 笔者将围绕这两个层面做进一步的阐发论述。

其一, “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或潜能实现, 既是社会生产关系变革乃至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性力量, 也是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历史先进性的主要表征。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 就在于它能够解放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被压抑或桎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潜能, 从而可以使其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也就可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奠定经济基础。当然, 这绝不意味着,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然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衰败的社会, 因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本身就包含着对于各种自然生态资源的科学合理运用——尤其是生态明智地进行利用, “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 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10](P117)}, 而且它还要受制于同样发达完善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关系, 将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主要经济生产活动的社会与生态理性性质。总之, 至少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 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仅不会存在冲突、而且是与他们所提出的“两个完成”(即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和“两个和解”(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目标相一致的。对于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而言, 尽管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等人接受了生存主义学派的自然生态有限性前提而主张社会生产能力缩减的“稳态经济”^{[11](P474)}, 但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仍是关于未来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性观点。他们所特别强调的是, 第一, 包括科技在内的生产力本身并不是反生态的, 其本质意涵是建立在自然(力)基础之上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拓展), 因而“发展有意识和可持续地控制生产的主体能力对于生产力概念是必不可少的”^②; 第二, 生产力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条件将能够孕育出生态环境友好的生产力形式, 因为“这种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2](P96)}。而在我国政策实践层面上,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其提高一直被当作衡量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性质及其演进的主要标尺。无论是党的十三大关于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断定(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 还是党的十九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的未来规划(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 都明确体现出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标识性意义。

其二, “大规模、集中化的经济生产组织形式”。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中,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形成与大规模、集中化的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侧面。“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 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 “它使人口密集起来, 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 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13](P374)[14](P36)}也就是说, 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集中化工业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表征, 其直接后果则是各种资源要素向中心城市和少数人群(资本家)的集聚, 并将导致不断扩大激化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斗争。但是, 矛盾的根源被认为不在于组织化的社会生产力, 而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价值观念体系, “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

^① 参见戴圣鹏:《经济文明视域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人文杂志》2020年第6期;程启智:《论生态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经济生态发展模式》,《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② 参见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13](P508)}。相应地,矛盾解决的出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变革或重建,尤其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4](P52)}。由此可以断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大规模、集中化的经济生产组织形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势,也将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重要表征。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总体上承继了这一理论立场,一方面批判大规模、集中化经济生产背后的资本主义增殖逻辑与支配关系,强调“在实践中对技术的任何抨击都必须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财产以及权力关系的一种抨击”^{[15](P332)},另一方面主张社会主义新型制度文化对这一庞大且复杂的生产力机器的合乎生态与人类进步追求的掌控规约,“联合生产代表了与健康的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潜在相适应的人类社会关系”^{[16](P256)}。本·阿格尔虽然始终强调小规模与分散化的工业生产的重要性,但他更为关注的仍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权力关系的变革意义,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11](P500)}。而在我国政策实践层面上,尽管中间发生过某些暂时性的逆向呈现——比如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之初的乡镇企业发展,但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还是验证了经济发展整体上一个日益大规模、集中化的演进过程。如今,三大三角洲区域、两大江河流域、若干个都市带(圈)和国家中心城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绝对主体骨架,而这样一种聚集构型很可能还将在未来得以延续甚或强化(比如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省会首位度竞争”和“南北差距拉大”问题)。

其三,“物质富裕的美好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美好生活的看法,主要不在于对现实个人的一般生活需要的承认及其满足,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7](P601)},而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生活状态的深刻批判与否定——除了物质生活层面上的普遍贫困或绝对(相对)贫困,还包括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异化或非自由状态。相应地,人们在实质性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将同时享受到物质消费富裕与自由个性解放的美好生活:“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7](P566)}。绝大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或多或少接受了自然生态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性意涵,并强调人类生活需要的满足应服从于社会生态理性的规约,比如威廉·莱斯所主张的“易于生存的社会”和安德列·高兹所提倡的“宁少但好”的生活方式^①,但他们也大都坚持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体制能够提供一种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而且是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意义上^{[18](P31)}。而在我国政策实践层面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最新表述,尤其是对于通过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来满足人们不断扩展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强调,集中体现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具体样态与满足方式认知的深度拓展或“绿化”,但现实中即便对于生态环境需要或“绿色(生态)需要”及其满足路径的政策阐释与大众文化感知,都还存在着明显甚或强烈的物质化色彩。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过程在经济层面上所提出的“诘问”或挑战,正是针对或指向了支撑着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经济愿景”的上述核心理念,亟需我们做出严肃的思辨与回答。

其一,经济持续增长追求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容限问题。任何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的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说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自然资源的源源不断供给和无限度的生态环境容量,而对于有限的地球空间和民族国家或区域空间来说,这两个条件的同时

① 参见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9页;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498页;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p. 28.

(长期) 满足都是难以保证的。在全球层面上, 无论是大多数种类的不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存储量(可开采量), 还是地球可以持续承载的人类经济活动总量(尤其是对于生产消费废弃物的消解吸纳), 都有着一定的限度或边界。对此, 如果说著名的生态哲学“盖娅理论”仍然是一个伦理价值规劝意义上的隐喻假说, 那么, 约翰·洛克斯特罗姆等人所提出的“地球边界”论点则是一种科学严谨得多的量化论证。他们的计算结果是, 对于作为可持续发展先决条件的“人类安全的行动空间”而言, 地球总共 9 个“生命支持系统”中已有 7 个处于越界或临界的危险状态^[19]。在国别或区域层面上, 迅速扩展的经济与生产全球化似乎使得少数所谓“世界工厂”的自然资源全球范围内配置成为可能, 但却在无形之中使得另一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尖锐, 即国家或区域性生态环境质量因触碰到其天然的界限或“天花板”而难以保持改善。事实是, 全球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总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处在加速增长的状态, 甚至是在因疫情而大幅度限制经济活动期间, 全球来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而我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也多次出现较为严重的大气污染^①。虽然还很难说全球经济活动在多大范围和何种程度上已经触及了地球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刚性边界”, 但却十分清楚的是, 跨区域甚至全球层面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严肃对待的“硬约束”, 而这与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因而可以说,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使命, 就是努力认识并自觉遵循对地球自然生态前提(规律)的客观性要求, 甚至还可以认为, 那将意味着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 只不过与它在古典社会主义语境下的那种“意象”已经有着天壤之别。

其二, 现代经济组织运行方式的生态环境风险及其管控问题。现代经济组织与运行方式的基本表征, 是大规模、集中化的工业与城市生产消费。应该说, 以商品经济体制和不断扩大市场为前提条件的这样一种现代经济体系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也的确有着显著的社会进步意义, 特别是在保障与改善数量迅速扩大的城市居民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即实现一种更好地社会(文明)制度保障的人类生活。由此就可以理解, 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 规模化、集约化的工业与城市生产消费也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意义上的肯定性特征, 尽管它将会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掌控与经济规划本质而与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大不相同——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凸显的是, 这种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属性的现代经济组织运行方式, 同样也会隐含、集聚和倍增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巨大风险。换言之, 与大规模、集中化的工业和城市生产消费相伴随的, 是庞大数量的各类自然物质资源的区域性或都市化聚集, 以及它们的生产消耗与生活消费所产生的各种类型废弃物及其集中处置。当然, 新冠肺炎疫情的源起既非直接来自生产消费废弃物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及其处置, 也很难说与现代经济组织运行方式的某一个环节直接相关, 但无可置疑的是, 已然形成的全球性经济生产消费闭环以及超大都市的枢纽性位置是疫情难以管控的原因。实际上, 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在 20 世纪末就已预警全球化进程加速所导致的不确定的社会与生态风险问题。前者把当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20](P20-22)}, 而后者则将生态风险视为基于复杂经济与技术体系的现代社会的必然后果, 认为“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 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构筑起来的”^{[21](P96)}。超大规模与过度集中的都市化经济生产消费体系, 确实存在着难以准确预判的生态系统脆弱性与人类健康风险, 并相应地大大增加了政府部门的公共健康安全管理与生态可持续性管理的成本或难度。一方面, 过度密集和高强度的工业与城市生产消费会使得整个都市区域的生态系统长期处于超负荷承载状态, 而作为个体或社群是无可选择或无能为力的; 另一方面, 又很难设想, 如何使某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工商行政管理入

① 参见《全球气候变化未因新冠疫情而止步》,《中国科学报》2020 年 9 月 11 日; 贺震:《新冠肺炎疫情时期, 雾霾缘何重现?》,《中国环境监察》2020 年第 Z1 期。

员始终对于一种病毒保持高度警惕,而反之则是,它有可能在数日之内危及超过千万的庞大人群。因而,真正的难题也许不是如何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城市和国家的风险管控能力,比如投资建设更多数量、更高科技水平的医疗基础设施和社会治理机构,而是深刻反思与重构目前的现代化经济组织架构及其运行方式。换言之,出路不在于如何保护好某一城市、区域或国家的生态环境,而是如何使它们的经济生产组织与运行方式实现生态化。而这对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但需要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更应实质性融入直至重构现代经济生产与消费本身,而这不仅是新时代的新“生态主义”,还是新时代的新“社会主义”。

其三,现代经济发展构型的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性问题。基于经济持续增长追求和规模化、集约化经济组织运行方式的现代经济发展,几乎就注定了它必然会呈现出的区域、社会阶层、种族、性别等维度上的不均衡性甚或极化现象。而社会主义制度变革的重要使命和合法性辩护,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这种不平衡性尤其是极化现象的经济社会制度条件。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一定时期内的和某种程度上的不平衡性甚或较大差距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也是如此。我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明显呈现出了东部沿海地区、区域中心城市、某些社会阶层率先发展或致富的阶梯型、非均衡特征,而这一特征又不可避免地衍生出许多物质财富分配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后果。而新冠肺炎疫情所凸显的是,这种社会物质资源与财富配置显著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格局和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社会公平程度与生态可持续性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一方面,由于不均衡的地域(城乡)物质资源配置所导致的超大规模人口流动本身,就有着明显的生态环境不可持续性后果,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庞大而复杂的厂房、设备、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持成本以及相应的大量自然资源消耗,而且大大增加了新冠病毒传播的几率和管控成本;另一方面,必须正视的是,在经济社会因疫情而陷入停摆期间,恰恰是普通劳动群众尤其是一些弱势社群不得不面临着病毒感染威胁去设法满足更为急迫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在疫情缓和之后又化身为“逆流而上的孱弱者”——成为经济社会重启的主力军。因而,强化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公正程度与生态可持续性水平,即致力于建设更具社会包容性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性目标,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目标实现与目前并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格局尤其是自然物质和社会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张力。对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框架与政治追求理应扮演一种“供给侧重构”主导者的角色,而这将是创造与制度性保障具有大众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决定性元素。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愿景”及其挑战

如前文所述,古典马克思主义论域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意指一种特定构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的自然关系”,而这种社会的自然关系既可以从经济层面或视角来理解,也可以从社会层面或视角来理解。相应地,当我们讨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时,其实蕴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前提性方面,一是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与经济政治文化原则来理解、对待与处置生态环境问题,二是需要整个社会基于一种社会主义质性的“社会关系”或生存生活方式。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使得这两个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与时代特征,突出体现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预设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愿景”与当前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换言之,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表征,就是并不完全具备一种和谐共生性质的社会的自然关系,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则可以理解为逐步建构并达致这样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过程。而笔者想强调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还凸显了我们更多是基于经典作家观点诠释

推演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愿景”所面临的严肃挑战,即必须高度关注同时在个体、社会或国家、国际层面上努力构建的一种自觉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社会关系。为了便于阐述与比较,这里也将从“社会愿景”的核心构成理念和它们所面临的挑战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其一,“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生态新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2](P190)}。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文化基础的废除,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个人将不仅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体,还将同时成为具有丰富生态感知及其践行能力的“生态新人”。对此,赫伯特·马尔库塞进一步阐释说,感性的解放意味着可以构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人与物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活其中的新型人类个体将会实现对自然及其生命价值的认可、尊重与保护——“他们拥有新的需要,能够找到一种不同质的生活方式并构建一种完全不同质的环境”^{[22](P344)}。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生态环境友好或生态自觉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体成员的重要品性,尽管这种品性主要是由社会主义新制度所培育和形塑的。戴维·佩珀指出,“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质,也不‘犯有’傲慢、贪婪、挑衅、过分竞争的罪行或其他暴行。而且,如果他们这样行动的话,并不是由于无法改变的遗传物质或者像在原罪中的腐败: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更加可能的原因”^{[5](P282)}。相形之下,本·阿格尔强调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态新人”对于现行生产与消费社会体制的超越特征。“我们并不仅仅需要‘文艺复兴式的人’,而且需要具有广泛知识才能的人,他们要能抵制僵硬分工的限制和协调的力量。对工人来说,要批判官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超出他们目前在生产和消费中所担当的有限角色去进行思考。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包括他们在其中所担当的新的角色)。”^{[11](P514-515)}而在我国政策实践层面上,生态环境科学知识的教育普及、生态文明观念的宣传推广和绿色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培育形塑,一直是党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及其实施的基础性方面。无论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还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都把“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和“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绿色生活方式”当作重要的目标任务,相信它们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断取得进步的标志性方面与社会文化基础。

其二,“自觉致力于生态公益维护的社会与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个体始终是社会存在物,这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它意味着,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个体将会有着高得多的科学文化知识素质与道德伦理品质,而广泛组织起来的社会以及至少作为一个过渡性政治实体存在的国家,将会更加自觉与有能力地扮演制度规约与教化平台的作用。就生态环境议题而言,无论是微观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内部及其彼此间的生产联合,还是宏观意义上的更具科学合理性与前瞻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自然生态保护治理,都预设了基于公共(集体)利益至上原则民主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包括国家拥有更好地共同控制与合理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能力和手段。比如,马克思就曾指出,“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全体的利益,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10](P697)}。基于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及其民主国家的生态意涵。比如,保罗·柏克特重点分析了共产主义的联合劳动与生态原则的一致性。“共产主义下财富的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合乎生态的,因为它们在维护和改善土地及其他自然条件的共同社会责任的要求下,蕴含了自然的审美和物质使用价值。”^{[16](P251-252)}相比之下,詹姆斯·奥康纳则着重论述了实现对自然生态条件的调节控制需要一个积极有为的民主国家。他认为,“原则上来说,国有制和中央计划可以使国家减少资源损耗、‘消极的外在性’(譬如污染)以及对环境的宜人性质的破坏。科学和科学家在社会主义计划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强化了这一原则”。因而,“正是这个国家——如果能处在市民社会的民主化控制之下——将会成为重建自然界,以及重建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基础”^{[15](P248,412)}。而在我国政策实践层面上,尽管可以想象与理解的是,社会的绿色转型只能是一个

逐步取得进展的渐进过程,甚至可以说,执政党及其政府所主导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本身就使得它们成为一股强大的经济主义或现代性力量并对特定时期的生态环境质量退化负有政治责任,但却从未被质疑或自我怀疑的是,它们也必将领导整个国家和社会最终走出这一绿色困境的主要政治力量。

其三,“基于生态负责与公正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格局)”。必须看到,我们当前所处的生态环境问题国际合作或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环境,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他们时代现实所预想的图景有着巨大差别。对于他们来说,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由于内在扩张本性及其历史进步性——“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23](P89-90)},将无可避免地扩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社会制度范式,而与这一历史进程相伴随的将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经济社会危机——当然也包括生态危机——的普遍化,并将通过随之发生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得到总体性解决。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替代不仅必将是合乎生态的,还会是全球性的,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新世界秩序构型的具体样态及其运行机制,他们并未做太多的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和强调的更多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集团的生态帝国主义政治与政策及其运行逻辑的批判,认为帝国主义的国际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废除就像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废除一样,是彻底克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所必需的。换言之,他们虽然承认生态环境危机或挑战的全球性质,却把政治斗争的矛头和焦点指向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社会关系架构及其社会主义替代。对此,詹姆斯·奥康纳指出,现代生态环境问题只有考虑其全球性层面才能获得恰当理解与解决,而未来的社会主义也理应是国际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将同时代表着对新自由主义与现在流行的许多地方主义的变种的一种取代”^{[15](P516)}。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认为,生态帝国主义与追求利润一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所掌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及其规则,通过外围国家不断加剧的生态退化来维持自身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而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球性“新陈代谢断裂”。因而,“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生态革命只能作为更大范围的社会革命——而且我坚持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发生”^{[24](P238)}。当然,也有人,比如霍华德·帕森斯强调了向社会主义的全球社会生态秩序的转变需要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策略。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通过对自然生态规律的逐渐认知与运用来提升和彰显其制度优势,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做出积极适应或回应,还要主动促进着眼于全球生态环境改善的全球团结,“今天劳动人民的斗争不仅是在社会主义存在的地方维护社会主义,和在社会主义不存在的地方去创建它们,也是为了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对非人类自然的破坏和剥削”^{[25](P104-105)}。而在我国政策实践层面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构型的中长期判断与表述已经从当初的推动社会主义世界变革逐渐调整为与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而后者也构成了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社会愿景”。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倡议,就是对于这一愿景的最权威性表述。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过程在社会层面上所提出的“诘问”或挑战,正是针对或指向了支撑着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愿景”的上述核心性理念,需要我们做出严肃的反思与回答。

其一,个体层面上的自然生态尊崇敬畏与绿色生活观念风格培育问题。经过新中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在迅速得到改善。这标志着我国长期追求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初步实现。但也必须看到,基本摆脱贫困和渐入富裕状态的普通民众,如何在遵循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享受更

高质量的生活, 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毋庸讳言, 我们正在全面步入并享受其中的高质量生活或“美好生活”, 其实仍主要是一种基于或仿效欧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大众化物质文化消费。而这就意味着, 从社会的自然关系的视角来说, 它不可避免地体现为社会个体(特别是作为消费者)与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之间的双重关系, 并且都可能呈现出彼此并不和谐甚或矛盾的一面。就前者而言, 必须承认, 支撑与延续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本身, 就是一种庞大数量的自然资源耗费与生态环境负荷——暂且不论当前国际经济分工所决定的我国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地位(“世界工厂”)所带来的额外负担, 相应地, 我们每个人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其实都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紧张关系。当然, 这并不是说要因此拒斥或放弃现代化建设和现代生活本身, 而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明确意识到我们享受现代生活的“生态成本”, 并且尽量减少这种成本或有所弥补。就后者来说, 不足为怪的是, 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存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 作为消费者的社会个体很容易会走向一些奢靡性、炫耀性、扭曲性的怪异、虚拟或象征消费需要及其追求, 而这种消费偏好或行为的蔓延, 则很可能会同时造成对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伤害。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 无疑是在我国已经长期存在、但却依然屡禁不绝的野生动(植)物消费, 其背后则更多是反科学的甚或病态的养生观念(“补身强体”)和错误低俗的消费观念(“炫富攀比”)。至于全国阻击疫情紧急情势下仍屡见不鲜的极少数个体的“生活丑态”(比如隐瞒旅行信息、拒绝自我隔离或佩戴口罩、硬闯防疫控制站点), 更是像照妖镜般地拷问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公民绿色生活认知和行为自觉。总之, “社会主义生态新人”首先是一个如何培育造就的问题^①, 而不能做任何理所当然意义上的前提性预设或自我宣称。

其二, 社会或国家层面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的日常制度化保护与社会成员的制度性规约问题。疫情爆发之后的紧急情势应对, 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的强大社会动员组织力与全国性资源调配能力, 从而使国内疫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实现了较为理想的控制。这无疑是应该高度肯定的。但客观地说, 这次疫情发生及其应对也暴露了我国从自然生态保护到流行性疾病防控等方面的诸多薄弱环节和制度性缺陷。从社会的自然关系的视角来说, 它们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的日常制度化保护, 既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够健全或不再适应社会现实需要, 比如亟需修改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也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的执法与司法过程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 比如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长期管理不到位, 以及各地地方性规章或习俗民风的日常监管督促作用的渐趋弱化甚或消失; 二是对社会成员尤其是关键性少数成员的社会制度性规约, 既表现为承担着某种社会监管职能的国家机关或公共部门职员的相应知识缺乏或能力责任缺失, 也表现为社会少数消费者和经营群体的无知或“三观不正”。疫情过后党和政府肯定会做出一系列亡羊补牢式的政策举措——比如 2020 年《生物安全法》的迅速制定实施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讨论修订, 但人们仍有理由追问, 这种大规模的严重公共健康风险是否可以仅凭借社会或国家掌控体系及其能力的不断强化来消除^②——如何走向一种更加健康的社会的自然关系也许更为重要与迫切。

其三, 全球层面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价值观的重大疫情(事件)协同应对问题。按理说, 无论是作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新一轮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客观性结果, 还是像“只

① 参见刘海霞:《培塑新时代生态人: 新冠疫情引发的理论与实践思考》,《兰州学刊》2020 年第 3 期; 欧巧云等:《习近平绿色发展观视域下“生态新人”探究》,《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 年第 6 期; 周琳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中的生态人培塑》,《齐鲁学刊》2018 年第 5 期。

② 参见邓雯等:《政治社会学视角下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反思: 基于我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观察》,《新西部》2020 年第 10 期; 潘家华等:《新冠疫情对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检视》,《城市与环境研究》2020 年第 1 期。

有一个地球”、“共同的未来”等这些广泛流行口号所深刻揭示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共同家园意涵已经是更加清晰可见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这样一种新时代需要的理念和价值观的精准概括。但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对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迄今所交出的却很难说是一份合格的答卷。直到2020年3月26日由沙特主持召开的G20特别峰会之前,它在相当程度上呈现为一场由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所领导或从事的多少有些悲壮的孤军奋战,中间还弥漫着大量的不和谐甚或不友善的“弦外之音”。令人费解的是,阻碍许多欧美国家正确理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阻击疫情努力甚至重大牺牲并提供必要的国际援助协作、至少可以利用难得的时间差“机会窗口”做好自己国家的防疫工作的,竟然是毫不隐讳的国家间经济社会利益竞争、秘而不宣的国家安全考量角力和显而易见的文化观念偏见。而当这次疫情进入它的下半场或欧美“主场”后,这些国家尽管不得不改变对于中国抗击疫情努力及其战果的公开立场,但却仍不情愿做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价值观相匹配的协同抗疫努力。因而,全球社会层面上更为有效的通力合作体制与机制来应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疫情或紧急事件,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文明)在社会的自然关系上的一个最大“供给短缺”(尤其是相对于民族国家和社会个体层面而言),而且并非不可能的是,这次疫情过后国际社会的制度化合作水平也许会走向相反的方向^①。而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环境来看,这次全球重大疫情应对无可辩驳地成为了展示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社会的自然关系的不同特质的舞台或“秀场”。因而理应明确,尽管对病毒及其传播本身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化阐释或“污名化”是错误的^[26],更不能过分强调或夸大疫情当前的国际社会间的合作互助障碍或猜忌,但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重大疫情(事件)处置以及社会的自然关系基本构型却绝不是政治与意识形态中立的,即便它们被(人为)饰以文化甚或种族多元性的伪装或托辞^②。然而,真正吊诡的是,也许恰恰因为这种社会制度框架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难以弥合歧异,我们所一直期望和促动的、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全球社会愿景”的“基于生态负责与公正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格局)”,似乎在将来变得更加不确定^[27],至少不再是一种可以轻易实现的图景。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难题”及其挑战

必须明确,古典马克思主义论域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替代的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或愿景,还是关于如何走向这一未来新型社会的变革道路及其战略,其要义是通过基于对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科学把握的广大劳动群众(工人阶级)的组织化革命性实践来最终实现。因而,无论是把生态环境议题理解为这场深刻社会历史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薄弱环节”,还是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本身理解为一个包含诸多层面和丰富内容的向绿色理想社会过渡或社会生态转型过程,我们都需要深入思考两个道路及其战略层面上的问题:一是施动者或代理人问题,即如何确定绿色变革者和被变革对象,尤其是绿色变革者的集体行动和个体观念行为何者具有政治优先性;二是驱动力和突破口问题,即如何把握绿色变革或转型的持续动力机制与革命时机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变革基础决定作用和社会文化政治动力的关系,而这也就是环境政治

① 参见《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秩序将何去何从?》,美国《外交政策》2020年3月20日;李小云:《全球抗疫战:新世界主义的未来想象》,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889995, 2020年4月9日。

② 参见韩欲立、陈学明:《新冠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弗朗西斯科·马林乔、李凯旋:《社会主义制度应对新冠疫情的有效性:来自中国的启示及对西方的反思》,《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学所指称的所谓绿色变革“进路难题”^①。而在笔者看来，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影响的思考，也应特别关注它们所提出和凸显的这样一些“进路难题”意义上的挑战^[28]，即我们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更认同或趋近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未来。与前两个问题的讨论一样，这里也分别从既有理论认知与现实问题挑战两个侧面来谈。

其一，“集体行动（或‘阶级斗争’）的优先性”。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而言，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和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的主要方式。这其中，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壮大、自觉意识到其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地位并诉诸组织起来的政治行动的无产阶级是至关重要的，而结果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社会，因为“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29](P299)}。绝大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既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友好性质，也接受了无产阶级集体行动主导的或进一步与生态运动联合的绿色变革道路。比如，詹姆斯·奥康纳强调，一种合乎生态的社会主义应当同时实现资本和国家向更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形式的深刻转变，而这就意味着传统劳工运动与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必须联合成为一种统一力量，因为“在全球资本的总体化力量面前，单个社会运动相对来说是软弱无力的”^{[15](P400)}。相比之下，戴维·佩珀不仅信奉社会主义原则本身的生态友好特质，还明确承认无产阶级集体行动在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战略中的主导性意义，“作为集体性生产者，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去建设我们需要的社会。因此，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5](P284)}。也就是说，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并不否认个体观念与行为变革的意义，但却明确将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置于政治优先地位。比如，戴维·佩珀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关注点既是个体及其潜能的实现，也是集体利益的促进”^{[30](P107)}。当然，也有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比如安德列·高兹认可并强调了社会个体的自发行动与价值观念变革对于整个社会生态理性的形塑与支撑作用。在他看来，高度自治的市民社会能够使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和目的利用自己的时间和资源，从而重塑个体的自由个性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并根据自身需求和偏好及时调整共同体的生产，最终促进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而社会资源共享、自我管理、自我活动空间的不断拓展正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31](P40)}。因为，“在复杂的制度中，所有寻求通过统一制度和真实生活、统一功能性他律工作和个人活动来消灭异化的企图，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32](P14)}。而在我国政策实践层面上，如果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还被更多视为一种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承担的公共管理政策及其落实，那么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则被普遍理解为一个党和政府统领下的有组织的绿色变革或转型过程。这其中，变革主体和变革对象之间并没有截然区分的界限，因为人民群众都已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体系及其运行的管理，而且，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以成为不同场景下的变革（教育）者或被变革（教育）者，因为他们都拥有对于整个社会绿色转型或重构的相同的民主权利。

其二，“经济变革进路的优先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决定性影响，反抗、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在根本上重建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性目标，而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经济生产与生活将会呈现出一种本质性的不同，并为更深刻的社会文化革新奠定基础。“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2](P574)}应该说，大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这种经济生产方式变革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创建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观点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并承认社会政治文化动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在资本主义动力

^① 参见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邹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172页；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159页。

机制的阻碍作用和社会主义动力机制的促进作用的意义上。比如,戴维·佩珀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生态仁爱性的关键在于它的经济学”^{[5](P145)}。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层面或物质生产方式上的改变,那么绿色的社会制度与价值变革就不可能成功地或内在一致地发生。相形之下,安德列·高兹更加强调精神文化革新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创建中的积极作用。他认为,未来新型社会将意味着“从一个生产主义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向一个拥有自由时间的社会的转变,在其中,文化与社会被赋予了比经济更大的重要性,简言之,就是向德国人所说的‘文化社会’的转变”^{[33](P183)}。当然,无论是对经济生产方式变革还是社会政治文化动力的重要性的强调,都展现出了日趋明显的环境(生态)主义思维或考量。比如,戴维·佩珀曾提到,“最终的自然限制构成人类改造自然的边界”^{[5](P283)},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必须做到在自觉尊重自然限制和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自然,在满足不断丰富和复杂的人类需要的同时保持令人愉悦的生态环境,而安德列·高兹则明确讨论了经济理性的界限及其自然物质前提,提出“保护自然资源比征服自然资源、维持自然循环比破坏自然循环更有效率且更具生产力”^{[31](P16)}。而在我国政策实践层面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党和政府所积极倡导、发动与推进的重大国家战略,同时具有强烈的公共政策体系重构、治国理政方略拓展和政治意识形态革新意涵,因而也就绝不只是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层面上的渐进式变革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生态文明经济的创建也被普遍认为具有特别重要与基础性的意义。

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过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所提出的“进路难题”意义上的挑战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如下两点也许是尤其值得关注的。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人民主体地位及其制度化问题。无论就其最终目标还是现实推进成效来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根本上都依赖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自觉与创新性实践,但无须讳言,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现实中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还明显呈现为一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政府作为主要倡导者与推动者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动员和组织,因而它的健康推进和实践效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逐渐外溢成为一种更可持续和广泛的“双向互动”^[34]。需要指出的是,从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变革的主体视角来看,这种互动性或人民主体性包含着如下两个层面:一是社会个体的民主权益保障与作用发挥,二是社会个体的认知行为绿化与自我成长。唯有二者兼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既符合社会历史规律要求、又具有相应的政治文化自觉的“集体行动”。但客观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所强调或彰显的却更多是“集体行动的绝对优先性”。一方面,面对突发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健康安全事件,党和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强力维护社会秩序、统筹调配物质人力资源、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健康安全的全面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在社会和基层社区层面上,虽然也有大量的社群和个体自主性抗疫参与行动,但最重要的则是全体市民(公民)主动遵守配合围绕疫情防控需要所制定的各种制度规定。这其中,最具根本性的是党和政府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和高度互信,而事实也充分证明,这种“准战时体制”对于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高风险突发事件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就此而言,这一极端性事件对于检验和推进我国公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大有裨益的^①,但也必须看到,它对于巩固与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主体地位”的借鉴参考价值是有条件的,甚至是双重性的。尤其是,极端和暂时情形下的无论是党和政府的总体上高效负责的应急管理体制与能力,还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担当、合作与牺牲精神,都并不能取代全社会需要通过更加努力的长期性付出和改变来逐渐创造一种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友好的社会主义生产和生活,而绝非仅仅是如何改变少数经济富裕却具

① 参见俞可平:《新冠肺炎危机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有不良消费嗜好社群的观念与行为的问题。

其二,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经济基础拓展问题。依据唯物史观,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未来图景离不开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的基础性支撑。而就我国的现实实践而言, 这样一种生态文明经济基础的创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不断完善是一个相互依赖、彼此促进的动态过程。无论是过去四十年左右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还是进入新时代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话语与政策框架下展开的, 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意涵在其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分量的过程。依此而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跃迁的一种“红绿”自我转型^{[35](P65-73)}。对此,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变化视角所做的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阐述, 是十分正确而深刻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绿色经济”必须同时是符合或趋近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但客观地说,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所强调或凸显的更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构筑起来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完整工业体系。基于此, 一方面, 党和政府可以做出更容易得到公众理解与支持的断然性应对举措, 比如对超大都市采取“封城”措施和对所有患者进行不加区别的免费诊治; 另一方面, 这一经济体系可以在相对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下保持较强的抗挫韧性和自我调整能力, 并保持国际社会的信心。因而可以认为, 我们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下的“安全孤岛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政策及其成就的验证。但也必须承认, 这一巨大成功对于构建和拓展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的借鉴参考价值同样是有条件的, 甚或是双重性的。这里的最大挑战还不是如何确保(促进)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式的经济实体的“红色规约”, 而是如何继续努力直至实现对现实中的各种绿色经济样态及其运行机制的“真实绿化”。换言之, 即便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与政策背景下,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也并不必然会呈现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经济或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如果再考虑到这次疫情过后很可能会风行一时的世界性“内卷化”经济与政治^①, 这种担心绝非是庸人自扰。

五、结 论

综上所述,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研究, 绝不仅仅意指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或生态思想的文本诠释或再阐释, 更在于结合时代条件对于合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制度构想的持续推进, 而那些发生于特殊时间节点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会扮演一种“临门一脚”的助推者角色。

在笔者看来, 2020年突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应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形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未来潜能的重大事件。一方面, 它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 更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未来图景的许多理论构想, 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这意味着, 我们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国际环境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与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的现时代和中国化结合, 尤其是不能热衷于那些并不具备现实条件的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理念的普遍制度化和过于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战略^②——比如, 既不能借助社会主义的政治手段或途径来激进引入

① 参见周大鸣、郭永平:《谱系追溯与方法反思:以“内卷化”为考察对象》,《世界民族》2014年第2期;郭继强:《“内卷化”概念新理解》,《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② 参见王雨辰:《构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推动生态主义性质的个体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变革,也不能用生态主义性质的道德伦理态度与选择来评判甚至绑架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政治与政策。

另一方面,它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同时基于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考量及其二者有机融合的历史和理论自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切实持续取得成效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前提性条件。这意味着,经历过这次百年不遇疫情之后,我们既需要从一种崭新的时代语境和理论视野来思考诸如从安全健康的个体日常生活到合理正当的社会的自然关系、从科学界定的美好生活需要到公平民主的需要社会满足方式、从超大都市上海的不夜城景色到亚马逊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保持等重大基础性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在创造出生态友好与负责的社区、社会与国家的同时成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合格“公民”^①,也需要深入思考并主动接纳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政治话语和政策在当代中国背景语境下的内在一致性,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36]。这其中,除了不言而喻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框架的政治坚持及不断完善,同样重要的是逐渐引导最广大人民群众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伦理观念嵌入到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新意象的创造、认同和践行。相应地,“绿色”将逐渐展现为社会主义的突出表征或内在本质,而“红色”则终将成为生态主义的政治趋向或实践逻辑。

参考文献

- [1] 邹庆治. 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曹孟勤.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新地平[J]. 云梦学刊,2020(1).
- [4] 邹庆治.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4).
- [5] [英]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 刘颖,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 [6] 邹庆治.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J]. 社会科学辑刊,2017(1).
- [7] 邹庆治. 生态文明新政治愿景 2.0 版[J]. 人民论坛,2014(28).
- [8] [英]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刚,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9] 邹庆治. 重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愿景”[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2).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加]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12]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宋兴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美]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6] Burkett, P.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 [英]戴维·佩珀. 现代环境主义导论[M]. 宋玉波,朱丹琼,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19] Rockström, J., W. Steffen, K. Noone, et al.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J]. *Nature*, 2009, 461.
- [20] [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21]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天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22] Marcuse, H. *Revolution and Utopia: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① 参见王雨辰:《从“支配自然”向“敬畏自然”回归——对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工业文明的反思》,《江汉论坛》2020年第9期。

-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共处[M]. 刘仁胜,李晶,董慧,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25]Howard,L. *Parsons,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M]. 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7.
- [26]陈培永. 马克思对“打病毒政治牌”的批判[N]. 北京日报,2020-03-23(012).
- [27]李义虎. 无政府、自助,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关系检视[J]. 国际政治研究,2020(3).
- [28]邹庆治. 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难题[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1).
- [2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0]邹庆治. 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 [31]Gorz,A. *Ecology as Politics*[M]. 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
- [32][法]安德列·高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M]. 彭姝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33]Gorz,A.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 London:Verso,1989.
- [34]邹庆治. 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引领作用 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J]. 绿色中国,2018(9).
- [35]邹庆治. 前瞻 2020: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全面小康[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18).
- [36]邹庆治. 生态文明理论及其绿色变革意蕴[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5).

Vision, Approach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of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Theory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HUAN Qing-zhi, LIU Qi

Abstract: Marxist ecology, emanated from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and its construction does not only mean the building of a set of public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systems around the goal of effectiv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but also the creation of new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that will take both the socialist politic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ecology into consideration.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2020 has given us many implications. The first implication is that many theoretical vis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which is based more on Marxist ecology or ecological Marxism in a broad sense, have apparent differences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second implication is that if the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ims at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final success,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ecology as well as their integration should be a prerequisite.

Key words: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theory; Marxist ecology; economic vision; social vision; approach dilemmas

(责任编辑 孙 洁)